

中苏党际关系研究的动态追踪与前瞻

陈立中, 赵梦瑶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准确把握 20 世纪中苏党际关系的脉动,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中苏关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发展进程、影响因素、历史特征三个方面。由于共产国际主要是在苏共的领导下运行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实质上体现了中苏党际关系。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党际关系中也包括了中苏党际关系。进一步深化对中苏党际关系的研究,需在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研究视角和方法创新;二是进一步拓展研究内容;三是进一步丰富新的研究资料。

[关键词]中苏党际关系;研究前沿;动态追踪;前瞻

[中图分类号]D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5-0063-09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5.009

The Dynamic Tracking and Foresight of the Research on Sino-Soviet Inter-party Relations

CHEN Li-zhong, ZHAO Meng-yao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impulse of Sino-Soviet inter-party relations in the 20th centu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oos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Sino-Soviet inter-party relations mainly focus on three aspects: development processes,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s Comintern operat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omintern virtually embodied the inter-part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which was also contained in CPC's handling the international inter-party relationship.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search on Sino-Soviet inter-party relations, three aspects should be carried out, namely, innovating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method, further expanding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further enriching new research data.

Key words: Sino-Soviet inter-party relations; research frontiers; dynamic tracking; foresight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也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站在临近百年的历史门槛上,回顾一个世纪来风云激荡的世界大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可谓是跌宕起伏,而 20 世纪中苏两党关系的发展又是其主流和焦

点。因此,准确把握中苏党际关系发展历程及研究成果,更能把握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脉动,对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推进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收稿日期:2020-07-10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YBA002);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XSPYBZZ057)

作者简介:陈立中(1975—),女,湖南益阳人,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赵梦瑶(1995—),女,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党际关系的界定及相关概念辨析

关于党际关系的概念界定,国内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广义的党际关系是指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其包含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1](P2-3)}。也有学者认为,党际关系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术语,是指一国政党与世界各党派之间的联系、交往与合作关系的总称^[2]。还有学者把党际关系称为对外党际关系、党的对外工作,甚至称之为党际外交^[3-4]。但在政党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党建等研究领域,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党际关系是指中国共产党与他国政党或政党集团之间为增进彼此了解而进行的交流交往。这也是我们所认同的。中苏党际关系是指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或苏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之间为增进了解而进行的交流交往。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国外政党的关系,是事关我党发展壮大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注重与国外政党发展党际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关系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党际交往虽然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与党政关系,使得学术界通常将关注焦点放在国家关系上,这样就掩盖了党际关系的特殊性。

为深化对党际关系的认识,有必要区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两个概念。在我国理论界,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既彼此纠缠又有明显区别,良好的党际关系可以有效推动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反之则可能产生负面的制约作用。从范畴上看,二者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党际关系的对象是“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而国家关系的主客体必须为主权国家。从内容上看,国家关系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涉及国家间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而党际关系主要是政党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流各自的思想、主张和看法,可以不涉及处理具体国家事务。从目

的上看,国家关系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而党际关系重在谋求各国政党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从历史发展看,中苏两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没能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区分开来,使党际关系的好坏影响到国家关系的发展。因此,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必须正确理解与区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以保证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5]。

深化对党际关系的认识,还需对党际关系和政党外交两个概念进行甄别。在我国学术界及外交实践中,党际关系和政党外交常常一起使用。有学者认为,政党外交是指一国之合法政党与他国政党或政党国际组织,为促进或影响国家关系、维护本国利益而进行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6]。这一表述指明了政党外交所具备的基本要素,即政党外交的主体必须是一国之合法政党,政党外交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作用是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而党际关系包括的国际间政党交往所处理的党际关系事务更加宽泛^[7],除了体现服从服务于国家关系和国家利益的这一部分党际交往,还包括如党务联系、维护政党自身利益的交往等。也有学者认为,党际关系和政党外交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活动在不同年代的不同称谓。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党际关系开始向政党外交转型,进入 21 世纪,政党外交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活动的代名词^[8]。因此,在当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和维护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党际交往的主轴,党际关系和政党外交这两个概念就其所对应的对象和内容来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重叠。

二、中苏党际关系的研究动态追踪

尽管国家关系与党际关系存在一定的分野,但由于较长时间内,中苏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搅在一块,因此,我们在把握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关于中苏党际关系的研究动态时,也将中苏

关系纳入其中加以考察。

(一)关于中苏关系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大量原始文献、档案史料、回忆录等相继问世,国内关于中苏关系的研究著述渐多。综观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苏关系发展进程、影响因素、历史特征三个方面。

第一,中苏关系的发展进程。沈志华教授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论述了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9]。另外,刘志青的《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罗志刚的《中苏外交关系研究》、曲星的《中国外交50年》、孙其明的《中苏关系始末》等著作对中苏关系演变的起因始末、发展轨迹进行了描述。2019年,中俄建交70周年,李静杰、王海运、李永全、左凤荣、刘显忠等学者对中俄关系进行了回顾和展望,都认为中俄关系70年,经历了从结盟到对抗再到正常化、关系持续深化的曲折历程,指出中俄两个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我们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把现在和未来的中俄关系维护好、发展好^[10-14]。

第二,中苏关系的影响因素。于洪君认为,革命战争年代及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两党因志同道合,虽不无芥蒂但彼此支持;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因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两党关系紧张,最终由于理论纷争与利益冲突交织引发大论战;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两党关系破裂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内外政策全面调整,但由于“三大障碍”难以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步履维艰;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风雨飘摇,中苏两国才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15]。部分学者着重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分析,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对外战略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冲突、领导人之间的好恶、

两国关系上的不平等^[16-24]。也有学者认为,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思维框架、朝鲜战争与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路线、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等因素对中苏关系的走向造成了一定影响^[25-29]。另外,孙艳玲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对中苏关系正常化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30]。

第三,中苏关系的历史特征。有学者认为,1949年至1992年期间,中苏关系的基本特点是高开低走到最后正常化^[31]。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凸显出浓厚的革命理想性、鲜明的统战策略性、高度的哲学思辨性等特征^[32]。中俄建交70年来,立足时代发展潮流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纲领,以政治互信为基石,以元首战略引领为动力,构建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宗旨的双边关系^[33]。

苏联与俄罗斯的学者则侧重于从历史纠纷和现实利益的矛盾、权力(领导权)博弈等角度来解释中苏关系的演变。如B.T.库利克认为,苏中两党分歧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双方领导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34]。列·别·杰留辛提出,各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期利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这些党成为执政党后,其阶级使命和奋斗目标也仍然一致^[35]。奥·鲍·鲍里索夫等的《苏中关系(1945—1980)》、Г.А.阿尔巴托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А.М.列多夫斯基的《斯大林与中国》、Н.Ф.费德林的《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等著作,也对特定时期的中苏关系进行了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逐渐减少,但也有相关成果。如阿尔兰·梅里克塞托夫等认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能否掌权持谨慎立场和怀疑态度,同时,出于对苏联国家利益的维护,莫斯科对国民党作出了让步^[36]。Н·Л·玛玛耶娃等认为,决定苏联向中国提供有效支援的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是考虑到日本可能向苏联发起进

攻的实际威胁^[37]。谢尔盖·N·贡恰罗夫认为,斯大林拒绝为中国共产党进攻台湾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使得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登陆作战极端困难^[38]。

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战史领域。有学者从中苏同盟内部的结构变化及美、苏、中三角关系变化来解读中苏关系,认为美国为分裂中苏同盟,有意对中国相继采取接触政策(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打入“楔子”)、极限施压政策、核武器压力等^[39]。也有学者从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联来解释中苏关系的演变^[40-42]。还有学者侧重于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冲突的角度来分析中苏关系的演变,如 Lorenz M. Luthi、James Whibley 与琼斯、凯维尔等认为,许多因素导致了中苏同盟瓦解,但意识形态因素最为重要^[43-45]。英国学者谢尔盖·拉琴科于 2009 年出版的《两个太阳:中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1962—1967》一书中认为,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是双方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美国学者高沃龙指出,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寻求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站在自己一方对抗日本,而中国一方面需要苏联对抗战的援助,另一方面又担心被人利用而不愿与苏联形成过密的战略关系,这些对中苏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46]。日本神田丰隆等学者则认为,1960 年代的日本对美、苏、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国际政治虽然影响甚微,但田中角荣的亲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秩序乃至推动中国融入西方都产生了影响^[47]。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

由于共产国际主要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运行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实质上体现了中苏党际关系。

郭德宏、曹军、黄修荣等国内学者全面阐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评价了共产国际的功过是非^[48-50],其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对苏联的交往活动,理解中国共产

党对苏联交往的思想渊源和行为方式。李景治指出,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过程中“功过兼有”,其积极作用是: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生存与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积极支持和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但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过程中也犯有教条主义错误^[51-52]。王庭科等学者着重探究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积极影响,认为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手段和前途,指导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产生具有促进作用;延安时期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以经费与物质援助^[53-55]。还有学者则着重探究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向青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期间,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上犯了“右”倾错误;第二次国内革命期间,共产国际在政治和组织上犯了“左”倾错误,导致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56-57]。也有学者提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路线且领导体制高度集中,导致中国革命屡屡受挫;抗战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严重脱离中国共产党实际;抗战初期对中国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忽略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对中国共产党产生重要影响^[58-60]。

苏联学者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在阐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时,则一味肯定共产国际的活动。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下半期开始,才注重从客观的历史角度而非主观的意识形态立场探讨共产国际的功过是非。总的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编辑出版了相关档案文献。如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等机构于 1994 年与 1998 年编辑的《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档案文件集(上下册),部分函电与中国共产党直接有关。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机构于 2002 年合编的《联

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3)》,公开了与中国有关的共产国际档案文件。这些档案资料被陆续翻译成中文,为中苏党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极大帮助。其次,出版了部分领导人与外交官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记述了他们本人的生活实践、当时中国所发生的大事件或不同历史阶段的中苏关系。如C.И.齐赫文斯基的《我生活中的中国(1930—1990年代)》;B.H.韦列夏金的《在旧中国和新中国——一位外交官的回忆》;H.C.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回忆录》;M.戈尔巴乔夫的《莫斯科和北京“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等。再次,开展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驻华代表机构工作人员的努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61];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联共(布)、共产国际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如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等^[62]。A.M.格里戈里耶夫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1920—1937)》一文中认为,莫斯科推行“左”倾对华政策造成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大革命失败以及中国共产党“左”倾盲动主义行动^[63]。

此外,美国学者肯尼思·休梅克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记述了1927年至1945年间中国国内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国共关系与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赫尔穆特·格鲁伯的著作《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英国研究者John W. Garver发表在《中国季刊》上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等,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也进行了研究。

(三)关于对外党际关系中的中苏党际关系研究

由于中苏党际关系很多体现在与其他国家党际关系之中,学界对此也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研究了党际关系的思想与理论。如朱建田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党际关

系思想,并以实践观照的形式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64]。佟静、郑蕊等学者分别着重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提出的基本依据^[65-66]。

二是编辑整理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史实纪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汇编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与《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系列书籍,综合整理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重要事件的史实纪要,内容详实,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交往的历史也被编其中。此外,当代世界出版社史料组编写的《历史瞬间的回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纪实》、王家瑞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郭业洲的《长风破浪会有时——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90年纪实》等,按照时间维度纵向开展研究,从历史层面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杜艳华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各个历史时期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交流的重大事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党际交流对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走向世界以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P19-23)}。

三是在探究与资本主义国家党际关系中论及中苏党际关系。黄宗良等主编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百年关系史》、舒新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理论与实践》等,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总结了关系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李丹慧提出,在中苏分裂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相互支持,形成了反修同盟^[67]。

四是研究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党际关系。有关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如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蒲国良的《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等,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对中苏两党关系进行了论述。

外交学院的伊士健、王秀娟与毛泽华在导师余科杰的指导下,分别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朝鲜劳动党的党际关系的历史演进。金龙则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中老建交后与老挝人民革命党党际关系的历史发展。

五是探索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党际关系。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推动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与亚非拉建交国政党外交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的良好格局^[68-69]。还有学者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赢得了支持,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为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与国家总体外交作出了重大贡献^[70-71]。

国外学者很早就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史展开研究,部分成果涉及对苏联党际交往工作的历史侧面和片段。如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其 2011 年发表的文章《中国的“静悄悄外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就着重介绍了中联部的角色、历史沿革、组织结构和活动。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苏联的帮助,但俄罗斯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扩张为双方埋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这个因素导致新中国成立后两国必将走向分裂^[72]。还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行的对外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政策展开研究。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季塔连柯与波尔加科夫分别在其文章《中国的文明与改革》与《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中提出,邓小平强调爱国主义、对外开放和努力学习所有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同它们进行平等合作等,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美国学者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对国家有着出于本能的忠诚,具有战略眼光且坚定维护国家利益^[73]。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 2011 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则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且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等重大外交事件进行了深度解读。

三、进一步深化中苏党际关系研究的前瞻

已有研究为我们了解中苏党际交往活动、理解中国共产党处理中苏党际关系的思想渊源和行为方式提供了直接材料和相关依据,但仍有很大深化空间。国外部分学者的研究虽然比较细致,研究手段和方法运用灵活,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真知灼见,为我们从不同角度研究带来了启发。如,他们比较重视我党领导人思想渊源的研究,比较注意从文化视角来研究我党领导人,而国内学者更多的是从政治视角来展开研究。但同时,由于历史纠纷和现实利益的影响,大部分国外学者在对事件的描述和评判方面带有较大的片面性和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一部分海外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存有缺陷,甚至是严重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结论的科学性。如中苏关系的“权力斗争”说,把中苏两国两党的分歧说成是为了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控制权(Lorenz M. Luthi, 2008)等。总的来说,国外学者的研究和认识带有先验论倾向,或多或少根据本国的发展模式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所走过的道路。

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史、党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有了良好开端,但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分散,理论支撑也不够。进一步深化对中苏党际关系的研究,需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一是从研究视角和方法进行创新。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大大丰富了中苏党际关系的内容,但目前对中国共产党处理中苏党际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等的视角,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处理对外党际关系的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不多见,更少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集体的角度进行探究。另外,对此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国家关系的视角进行探究,较少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党建的角度来研究;研究方法主要侧重文献综述与

逻辑分析,还需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学理研究:(1)比较研究法。一方面,纵向比较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处理中苏党际关系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和实践过程,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处理中苏党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和特征。另一方面,横向比较中苏两个执政党在处理中苏政党关系上的差异性思维方式、行为方法,从总体上明确和把握中苏党际关系发展的特殊历程。(2)文献计量统计法。就特定时期中苏党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设置若干要素,进行数量统计分析,显示出其发展的大趋势,从中发现问题、概括特点、总结经验、揭示规律等。研究过程既尊重党际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遵循党际交往自身的发展规律,从而使党际交往的实践及研究与时俱进。

二是进一步拓展研究内容。目前,学界主要是分段式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党际关系的处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的研究比较薄弱,尤其没有系统整体地研究20世纪中国共产党处理中苏党际关系的历史,没有系统梳理和挖掘期间的经验教训,并对应党的思想理论、政策主张每一条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以资当前发展党际关系借鉴^[74]。此外,中国共产党处理中苏党际关系的学理和实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部分具体问题无论在学界和政界都仍留有商榷的余地。如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中苏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问题、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问题等。有些问题则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如中苏党际关系的制约因素、对国家关系发生作用的途经等。

三是进一步丰富新的研究资料。梳理20世纪中国共产党处理中苏党际关系的历程,研究材料除了依据两党主要领导人关于双方交往的论述以及党的决议、决定外,还需扎实研读《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人民日报》以及中联部网站上的

相关资料,并尽可能对第一手历史资料进行认真挖掘,吸收和参考中苏两党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的回忆录、双方党和政府新近解禁的机密文件档案等。此外,在研究观点上也应当参考他国学者,特别是苏联与俄罗斯学者的相关观点与成果,依据两党两国在具体历史问题上的真言实行与方针政策,厘清中国共产党相应方针政策的演变过程。如此,则可以进一步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杜艳华,等.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交流史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2] 孟华玉.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90年的历史思考[J].理论导刊,2011(8):51-53.
- [3] 余科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关系的历史考察[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1):59-69.
- [4] 周余云.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J].新远见,2011(7):50-60.
- [5] 陈立中.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党际关系原则论析[J].学术界,2010(3):174-182,275-278.
- [6] 余科杰.论“政党外交”的起源和发展——基于词源概念的梳理考察[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4):124-136.
- [7] 余科杰.关于政党外交研究的若干思考[J].新视野,2018(1):116-122.
- [8] 贾美超.从“党际关系”到“政党外交”再到“大国特色”——当代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调整与转型[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9(4):32-36.
- [9] 参见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10] 参见李静杰.中俄关系七十年[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4):1-15,155.
- [11] 王海运.中俄关系70年:回顾与展望[J].俄罗斯学刊,2019(4):5-19.
- [12] 李永全.70年风雨兼程——中俄关系回顾与展望[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5):11-19.
- [13] 左凤荣.中俄关系70年的发展历程与经验[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5):20-28.
- [14] 刘显忠.中国的苏联历史研究七十年[J].世界历史评

- 论,2019(3):170-190.
- [15] 于洪君.从弥足珍贵的互助同盟到代价深痛的全面对抗——关于冷战时代中苏关系演变路径与教训的再思考[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4):16-36,155.
- [16] 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J].党的文献,1998(2):3-5.
- [17] 孙泽学,唐年新.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98-104.
- [18] 李静杰.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及其美国因素[J].东欧中亚研究,2000(3):3-14.
- [19] 滕帅.部分核禁试条约的签订与中苏关系(1962—1963)——对肯尼迪政府分化中苏同盟政策的再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17(9):62-70.
- [20] 孙其明.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破裂[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20-26.
- [21] 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J].国际政治研究,2001(2):53-63.
- [22] 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J].历史研究,2001(6):103-119,191.
- [23] 薛钰.对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若干问题的再思考[J].中共党史研究,1996(2):69-76.
- [24] 左凤荣,潘正祥.中苏大论战:起因、焦点与教训[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1):3-5.
- [25] 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
- [26] 沈志华.中朝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120-127,195-196.
- [27] 沈志华.中国在 1956 年 10 月危机中的角色和影响[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3):118.
- [28] 俞邃.苏共二十大的内外反响和中苏关系[J].百年潮,2008(3):38-44.
- [29] 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 1960 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1960 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一[J].社会科学,2006(6):132-162.
- [30] 孙艳玲.中苏关系正常化与邓小平对苏外交决策[J].冷战国际史研究,2009(0):187-222,10.
- [31] 孔寒冰.中苏关系史的特点及其研究现状评析[J].俄罗斯研究,2004(2):66-73.
- [32] 刘启明.基于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指导下的对苏关系的特征分析[J].世纪桥,2019(1):7-9.
- [33] 刘军,苟利武.中俄关系 70 年:历史反思与未来构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5):29-34.
- [34] 马贵凡.近十年来俄罗斯史学界对中共党史的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00(6):86-91.
- [35] [俄]列·别·杰留辛.关于苏中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J].陈夕,译.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3):100-110.
- [36] [俄]阿尔兰·梅里克塞托夫,[美]亚历山大·潘佐夫,姚昱.论中国的斯大林化[J].冷战国际史研究,2006(1):139-174.
- [37] [俄]H·JI·玛玛耶娃,李旭.中日战争时期的苏联、美国和中国“统一战线”[J].社会科学研究,2010(4):144-151.
- [38] [俄]谢尔盖·N.贡恰罗夫.科瓦廖夫访谈录:对史实的两点解释[J].郝江东,译.冷战国际史研究,2018(2):167-192,6.
- [39] [美]艾伦·林奇,杨辉.美国与中苏联盟(1950—1965 年)[J].俄罗斯研究,2019(6):61-90.
- [40] [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41] [美]R.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M].[美]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42]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M].魏海生,艾平,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 [43] [美]Lorenz M. Luthi.中苏分裂:共产党世界的冷战[M].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
- [44] [英]琼斯,[英]凯维尔.中苏关系内幕纪实 1949—1984[M].郭学德,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 [45] James Whibley.No One's World:The West,the Rising Rest,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J].Canadian Foreign Policy,2013(19):115-117.
- [46] [美]高沃龙(Garver, John W.).对手与盟友[M].刘戟锋,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326.
- [47] [日]神田丰隆,陈洪运.中苏分裂与 1960 年代日本的对华政策[J].冷战国际史研究,2017(1):92-108.
- [48] 郭德宏,主编.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述评[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 [49] 曹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 [50] 黄修荣,黄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 全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51] 李景治.实事求是评价共产国际历史地位和贡献[J].理论视野,2019(6):82-90.

- [52] 刘淑春,佟宪国.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评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0):151-158.
- [53] 王庭科.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
- [54] 张喜德.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促进作用[J].探索与争鸣,2010(9):25-30.
- [55] 张俊国.延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及其援助[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7):9-12.
- [56] 向青.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6):26-39.
- [57] 向青.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J].近代史研究,1980(4):92-116.
- [58] 吴明刚.试论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J].福建党史月刊,2003(11):37-39.
- [59] 孙泽学.论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的认识[J].中共党史研究,2009(9):71-80.
- [60] 王新生.试探九一八事变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策及对中国共产党影响[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5):83-94.
- [61] [俄]H·П·玛玛耶娃,王利亚,杨丽萍.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为历史文献史料的“俞秀松个人档案”[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8):13-17.
- [62] [俄]根·安·久加诺夫,刘淑春.共产国际的宝贵经验[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5):26-32,93.
- [63] [俄]A.M.格里戈里耶夫.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1920—1937)[A]//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1919—1943)[M].莫斯科,2002:298.
- [64] 朱建田.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5] 佟静.试论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提出的基本依据[J].中共党史研究,1994(3):11-15.
- [66] 郑蕊.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党际关系理论的探讨与实践[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2):11-14.
- [67] 李丹慧.中苏分裂与中日两党反修“同盟”——1960—1965年中共与东亚共产党党际关系研究之一[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68-91,185.
- [69] 余科杰.论当代中国对拉美非建交国政党外交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特征[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6):115-121.
- [69] 肖枫.新中国70年党的对外工作的历程和经验[J].科学社会主义,2019(6):24-30.
- [70] 周余云.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J].新远见,2011(7):50-60.
- [71] 石晓虎.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实践与理论创新[J].当代世界,2019(7):4-9.
- [72] Bruce A.Elleman.Diplomacy and Deception:The Secret History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1927[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9(1): 280-281.
- [73]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1-22.
- [74] 陈立中.十八大以来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研究评述[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3-54.